

中国古代文献学

赵荣蔚 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献学 赵荣蔚编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8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 8辑 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79-3

I. 中… II. 赵… III. 古文学—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5)第 076950号

中国古代文献学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号 100811

印 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10

字 数:278千字

印 数:1000册

版 次:2005年 8月北京第 1版

印 次:2005年 8月第 1次印刷

全套定价:260.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 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4.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古代文献的形式	(7)
第一节 早期文字记录的材料	(7)
第二节 书籍形式的演进	(11)
第三节 古代文献聚散概况	(20)
第二章 古代文献的类型	(24)
第一节 经部文献	(24)
第二节 史部文献	(33)
第三节 子部文献	(47)
第四节 集部文献	(57)
第五节 丛书	(87)
第三章 古代文献目录学	(97)
第一节 目录的性质和功用	(97)
第二节 目录书的体例	(101)
第三节 目录类例的沿革	(113)
第四节 常用文史工具书书目	(120)
第五节 汪辟疆先生《读书举要》补	(136)

第四章 古代文献版本学	(166)
第一节 版本学的内容及其功用	(166)
第二节 古籍版式及历代版刻特点	(170)
第三节 古籍版本的类型	(177)
第五章 古代文献校勘学	(188)
第一节 校勘与校勘学之源流	(188)
第二节 校勘的意义及功用	(191)
第三节 校勘的基本方法	(199)
第六章 古代文献注释学	(214)
第一节 古代文献的注释名目	(216)
第二节 古代文献注释的新要求	(222)
第三节 古代文献新注释本谬误举隅	(231)

附录一

汉书·艺文志总叙	班 固 (251)
隋书·经籍志总叙	长孙无忌 (25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	纪 昀 (257)

附录二

唐《诗人主客图》散论	(281)
《唐音审体》的体例特色	(289)
《古今图书集成》对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整合	(298)

主要参考及引用书目	(305)
------------------------	-------

绪 言

中国古代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密切关联。同时,古代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它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因此,古代文献学不仅为研究整理古代文献典籍的专门学者所必修,对于古代学科的研究者(包括经学、文学、历史、哲学等)来说,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为它关系到对史料的搜集、驾驭、精通和考辨。甚至对一般需要阅读古代典籍以加强文化素养的人来说,知道一些古代文献学的知识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古代文献学又带有基础学科的性质。

一、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南宋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二中注释此段文字道:

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

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

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亦云：“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近人刘师培在《文献解》中进一步申说道：“仪、献古通。书之所载谓之文，即在人所谓典章制度也；身之所习谓之仪，即古人所谓动作威仪之则也。……孔子言夏殷文献不足，谓夏殷简册不备，而夏殷之礼又鲜习行之士也。”《辞海》中用“原指典籍与宿贤”一语解释“文献”一词的本义，显然是沿袭了朱熹之言。“献”，在此专指“贤者”、“贤才”，即故旧耆老的言论。我国古代学者无一不注重“征文考献”，即是说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和文化，一方面要取证于书本的记载，一方面还要探索耆旧的言论。言论的内容，当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有关评议在内。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最先用“文献”二字自名其著作，他的《文献通考》是一部贯通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著名政书。在《自序》中，马端临对“文献”一词的涵义也做了说明：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由此可见，《文献通考》的取材有两个方面：一是书本的记载，二是学士名流的议论。由于马端临是宋末宰相马廷鸾之子，这就给他在当时搜集史料、接纳名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他这部 348 卷的著作中，甄录时人议论极多，连他父亲的话都采入了。其写作形式，充分体现了“文”和“献”相互依倚的作用。凡是顶格写的，都是书本记载；凡是低

一格写的,都是名流贤者的议论。二者交相为用,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文献通考》。

值得注意的是,将书本记载和宿贤议论共依并重,交相为用,是古代学者治学之通则,并不是从马端临才开始的。司马迁《史记》在记叙史实的同时,收录了不少文辞、言论;班固的《汉书》中,凡是与学术、政治相关的重要论文,亦都一一载入传中。此后,历代正史,也都沿用了这一体例。如果再溯流而上推之,《尚书》中的《典》,叙述事实;《谟》,记载言论。《左传》一书,于叙事之外,常用“君子曰”以抒发言论。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以“文”和“献”为主要内容,起源很早。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一词的意义渐渐发生了演变,元代诗人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东土校全经”,其“文献”之义已经与今天“文献”的内涵接近,特指典籍资料。明成祖时,编《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也取义于包含各类图书在内的意思。稍后,程敏政作《新安文献志》;清代钱林辑《文献征存录》,都将“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文献”一词的概念,尚未有一个公认明确的定义。各种辞典和专著对“文献”的解释歧义迭出,莫衷一是,如《辞海》释之为:“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辞源》释之为:“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现代汉语词典》释之为:“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科技文献检索》(1981年版)释之为:“是用文字、符号或图形多方式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信息载体,是人类脑力劳动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科技文献检索》(1980年版)释之为:“大凡人类的知识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的手段记录下来的东西,统统可称为文献。也可称为固化在一定载体上的东西。”《文献》1985年第4期刊载的邵胜定《说文献》以为:“文献就是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一切领域内人类活动(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及所取得的文明进步),对后代说来是具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作用的,以文字记录形式(后世还包括音响和

图象的形式)存在的资料。”

大体上可以说,历史上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历史资料都属于文献范畴。

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产生和发展,“文献”一词的涵义也会越来越宽泛多样。

二、古代文献学

古代文献学,简言之,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搜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

我国古代文献学虽然源远流长,但文献学这一名称却直到清末方才出现。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清初史学之建设》中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在此之前,人们习惯地将从事于研究、整理古代文献的学者称之为校讎学家,因而,校讎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这是因为传统的文献工作大都是随着古代每一次大规模地整理图书的书目工作而逐渐发展形成的。

由于古代文献典籍的内容和形式的复杂,因而,阅读、研究、整理它们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技能。清代著名文献学家戴震曾经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以示后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

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齟齬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义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纵横宜辨。汉末孙叔然创立反语,厥后考经论韵悉用之。释氏之徒从而习其法,因窃为己有,谓来自西域,儒者数典不能记忆也。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槩,毫厘不可有差。

这里虽就攻读经书的甘苦而言,实际上概括了研读、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所需具备的全面知识,其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法、乐律以及思想义理的剖析等等。以上还仅限于从古代文献的书面语言形式及其所表达的具体内容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从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工作的主要环节来看,更需掌握目录、版本、校勘、标点、注释、辨伪、辑佚、编纂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中国古代文献学主要以中国古代文献为对象,以目录学原理为基础,并运用版本、刻印、校勘、辨伪、注释、编纂等知识和检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组织和检索中国古代文献工作的规律和方法的学科。它的内容核心是中国古代文献和书目,即古代文献的内容和目录学的结合。它的主要内容范围和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揭示和报导中国古代文献的内容、源流和类别,评介主要的中国古代文献,研究古代文献出版情况和出版物的类型,介绍古代文献的注释研究和版本目录资料,提供

熟悉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和条件;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利用,介绍有关的重要书目和工具书,探讨古代文献检索的原理和基本途径,提供检索中国古代文献的工具和方法。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查明、揭示和宣传,把有关的文献信息系统地介绍给初学者,帮助人们阅读和利用中国古代文献,引导他们在充分掌握本学科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从事学习和研究。

第一章 古代文献的形式

一般说来,我国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主要包括简牍、帛书、纸写本、印刷(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图书等四大类。它的产生和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早期的文字记录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刻石文字等,可以看作是书籍出现的先声。

第一节 早期文字记录的材料

一、甲骨

根据地下已经出土的材料,我国最早的文字记录是 3500 多年前殷商时期的“殷墟甲骨”。甲是龟甲,骨是兽骨,特别是牛的肩胛骨。刻写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称为甲骨文。

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发现的。在他治病所服的中药中,有一味称为“龙骨”的药,上面刻有古文字,王氏断定这是一种古代文字,于是就将药铺里的“龙骨”全部买下,又派人四处搜求,共得 1500 片。王懿荣去世后,甲骨为丹徒人刘鹗所得,他继续收集,约得 5000 片。1903 年,刘鹗择其中字迹完好者 1058 片,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的专书。1904 年,孙诒让据此撰成《契文举例》二卷,是为我国学者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开始。其后,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继续搜访和研究,罗振玉先后所得近 3 万片,编印了《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后

编》、《殷墟书契续编》等，加以著录和考释。王国维编《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并于1917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等著名论文，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把甲骨文研究与商代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大成果。他们论定甲骨文是殷代后期从盘庚迁殷到纣辛灭国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这一段时间的遗物。因为这是殷朝的一种文书，所以后来人们又称甲骨文为殷墟文字。

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殷人对于田猎、农事、天象、年成、征伐、疾病、祭祀等活动的占卜记录。甲骨较硬，文字是用刀刻上去的。甲骨文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古老而有系统的文字记录，它对研究古代社会的政治和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仅是记录在案的史实，形同档案，同用于传播知识、交流思想、记录经验的书籍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

甲骨文发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甲骨的辨伪和缀合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1965年，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甲骨文编》，收录4672字，附录2949字，可识者达900余字，每字注明出处，加以简要说明，甲骨文刻辞中当时所见的已释和未能释定的单字，基本上已收录齐备，可以作为甲骨文的字典使用。于省吾关于“独体形声字”的发现，对我国古文字研究有重大意义，他所编著的《甲骨文字释林》及主编的《甲骨文考释类编》对于甲骨文字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是一部全面整理和研究甲骨文以及商代历史的煌煌巨著，是甲骨文研究的总结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甲骨4万多片，按五期分22类编纂而成，全书共13册，它集我国80年来出土甲骨文字之大成，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二、青铜

继甲骨文之后的文字记录是青铜器铭文。公元前1300多年前的商代后期，已经有了青铜的铸件，其上常常铸上或刻上文字，即“金文”。青铜器的种类很多，大体可分为礼器（即祭器）、乐器两大类，此

外尚有兵器、食器等。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所以前人又往往用钟和鼎作为一切铜器的总称,因而铜器铭文亦称“钟鼎文”。

青铜器在当时极受珍视,特别是其中的礼器,更是统治者权力的象征,称为“重器”。春秋战国之时,灭人之国必须“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毁宗庙乃绝其后嗣,迁重器则表示权力转移。青铜器上的文字,记载着铸造本器所经过的重大事件,以示长留人间,永志不忘。铭文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以赏赐、锡命为多。

从西汉开始,历代都有青铜器发现。宋代以后,随着青铜器出土的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开始从事青铜器的系统研究,吕大临《考工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至今仍然是研究金文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朴学发达,金石考据之学更是盛极一时,学者们利用铜器铭文,证经补史,成就斐然。吴大澂《字说》、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均是研究金文很有影响的专著。而王国维的《说觥》、《说彝》、《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文,更有许多卓越见解和重要发现。近现代研究青铜器的重要著作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 1957年版)、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科学出版社 1958年版)、陕西省博物馆及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青铜器图释》(文物出版社 1960年版)等。而容庚的《金文编》(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周法高的《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4年版)则是查考金文的重要工具书。

三、刻石

刻石记事同铸器记事一样,在我国古代非常盛行。石头来源广泛,取材容易,能够长期保存,而且载文面积大,加工工艺简便,在古代是一种理想的记录材料,在记功、追远方面,比青铜器有更多的优点。

现存最早的石刻是唐代初年在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石鼓,时代约在春秋战国期间,在 10 块鼓形石上,每块各刻有四言诗一首,内容多为歌咏贵族畋猎游乐生活,字体为籀文,后人把这种刻在石鼓上的文字称为